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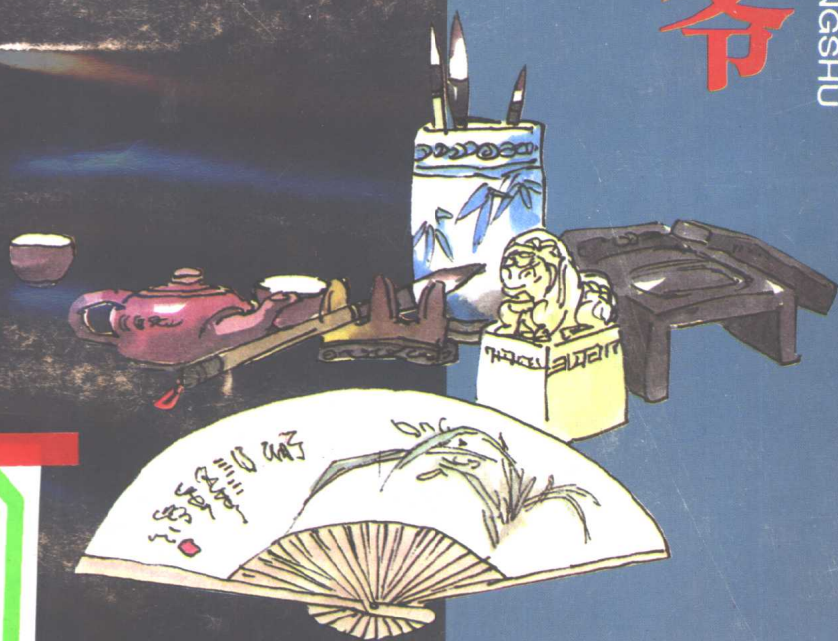
区域人群文化丛书



QUYU RENQUN WENHUA CONGSHU

绍兴师爷

王振忠
著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区域人群文化丛书

绍兴师爷

王振忠 著

丛书主编 邹逸麟 / 副主编 王振忠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绍兴师爷

XIAOXING SHIYE

王振忠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:350001)

福州方盛印务有限公司激光照排

福州荣利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.375 印张 4 插页 127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211-02845-9

G·1951 定价:7.7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

丛书总序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历史上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、变化和扩散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。不同区域的文化、经济背景，孕育了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各地自然条件纷繁复杂，风俗习尚也丰富多彩。早在先秦时期，中国人就对各地的人文现象给予了特殊的关注。《礼记·王制》篇曾指出：“广谷大川异制，民生其间者异俗。”在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，世世代代环境的熏陶和文化传统的规范，造就了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各地人群。尤其到了明清时期，随着社会动荡，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，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，生计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地人群的首要问题，救荒也就成了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。17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：

重农固为务本，但今人稠地窄处，竟有无地可耕，因其土俗，各有力食之路，便非游手，此亦救荒源头。
(《祁彪佳集·救荒小考》)

这是对治生手段的一种崭新的认识。显然，各地的芸芸众生，都“因其土俗”，开拓自己的“力食之路”。经过数代的家传户习，不同区域的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，也就塑造出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，并逐渐成为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。于是，在浙东的会稽山麓、镜湖之滨，涌现出了大

批砚田笔耕、游幕四方的“绍兴师爷”；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，则孕育出呼朋引类、席丰履厚的“徽州朝奉”；晋中盆地的祁、太一带，出现了汇通天下的“山西票商”；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女真后裔，入主中原大地后，形成了一批靠铁杆庄稼为生的八旗子弟；……这些闻名遐迩、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区域人群，在近数百年来，曾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中国人素有“沾着乡土”的心理，对桑梓乡土的眷念，总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天性。不同区域的人群成员在移居他乡时，都竭力保持某些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和其他的社会风俗习尚。这往往会给侨寓地深深地打上区域人群的性格烙印，程度不同地引起整个社会风尚的变迁。

鉴于以往学者多注重于对中国人整体作宏观性的探讨，但对“区域人群”作系统的区域性的文化透视，则迄今未见。因此，我们推出这套丛书，意在加强这方面的探讨，以期对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。基于以上认识，本丛书选择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人群，加以文化透视，力图透过对区域乡土背景、各地人群的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的把握，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。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学术界的大力支持，也盼望有更多的研究论著加入本丛书的行列。

编 者

1994年3月

目 录

丛书总序	(1)
一 引言	(1)
二 一张苦嘴，一把笔刀	(6)
(一) 稽山镜水间的刀笔之乡 ——绍兴师爷的故土	(6)
(二) 无绍不成衙 ——胥吏与师爷	(19)
(三) 入幕须知 ——门径和规矩	(34)
三 公门中好修行	(54)
(一) 合则留，不合则去 ——师爷的脾性	(54)
(二) 八面玲珑剔透 ——处世为人之道	(66)
(三) 多谋善断 ——判案的技巧与伎俩	(88)
四 谁知我心	(104)
(一) 梦魇 ——轮回报应的恐惧	(104)

(二)	进取门难寻，浮沉命未知 ——师爷的烦恼	(118)
(三)	孤灯燃客梦，寒杵捣乡愁 ——桑梓情深	(135)
五	绍兴“三通行”	(149)
(一)	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先生肥狗胖丫头 ——京师“南风”	(150)
(二)	小唱不唱曲 ——绍兴乡音的传播	(161)
(三)	“名士”、“光棍”逐鹿中原 ——走俏的女儿酒	(165)
六	结语	(173)
(一)	二花脸 ——社戏中的师爷形象	(173)
(二)	社戏落幕以后 ——绍兴师爷之我见	(180)
	主要参考文献	(191)

一 引 言

在浙江绍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：古代有个常败将军，惨败之余，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战战兢兢地写上“屡战屡败”的字样。绍兴师爷看了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提起笔来轻轻一勾，“屡战屡败”一变而为“屡败屡战”。虽然字词依旧，事实未改，但气势却有了微妙的变化。结果，看过奏折的皇帝不但不予惩处，反而大加赞赏。这位常败将军不仅免受杀身之祸，而且还得了“顽强不屈”的美名。有人说，这个“常败将军”就是与太平军作战出师不利、大名鼎鼎的“文正公”——曾国藩。

然而，尽管我遍查了曾国藩幕僚的籍贯，却找不到那位足智多谋的师爷。甚至在曾氏幕府中还找不出一个出自绍兴的师爷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平心静气一想，觉得传说大可不必当真。不过，这却透露出一个信息，那就是——在世人心目中，满腹经纶、富于韬略的师爷，一定要是绍兴人才算正宗。这从明清以来流传下来的民谚、俗语中也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。

明清时期，江南一带素有“徽州算盘，绍兴刀笔”之谚。前者说的是皖南的徽州人很会做生意，他们垄断了盐业、典当、钱庄、粮食等诸多行业，在当时的全国各地，处处都有徽州人的足迹，所以在长江沿线一带素有“无徽不成镇”的

说法。根据近数十年来历史学者的研究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不过，“徽商算盘”的形象也还经过了文人们的着意烘托。因为在传统心理上，中国人最善于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。例如，在三言二拍等明清市井言情小说中，徽商登台亮相的机会总是随处可见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：在生意场上，似乎是“无徽不成商”。与此相对应，绍兴的刀笔也以老辣著称。这一方面固然是师爷们的真实写照，但在另一方面也出自同样的心理，亦即受到了世人的竭力渲染。尤其是到清代，“无绍不成衙”成了尽人皆知的一句名谚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绍兴人从事这份职业，从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——师爷非绍兴人莫属。晚清著名的小说家李伯元在《文明小史》第三十回中说：

……绍兴府有一种世袭的产业，叫做作幕。……说也奇怪，那刑钱老夫子，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，因此，他们结成个帮，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脚。

虽然幕府制不始于清代，但绍兴师爷的大批涌现，却是有清一代比较独特的一种人文现象。当时，上自总督、巡抚官署，下至州县衙门，往往都要聘请几位有才识、能干的人才处理行政事务，称为幕友（也叫幕府、幕客、幕僚、馆宾、西宾和宾师等）。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，雍正元年三月乙酉（1723年4月10日）谕吏部：“各省督抚衙门事繁，非一手一足所能办，势必延请幕宾相助，其来久矣。”并下令此后总督、巡抚延请幕客，必须挑选“历练老成、深信不疑之人”，并将姓名具题上奏。显然，这种延请幕僚襄理公务的做法，成了满族统治者的一项既定国策。笔者认为，这与清代前期满、汉

之间的民族隔阂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满人入关初始，对汉人猜忌甚重。如在许多旗人驻防城市建立“满洲城”，圈定旗界，禁止汉人定居。在职官制度上，重用满员，猜忌汉官。但由于当时天下纷扰，作为周边民族入主中原，虽然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，但在文化上却与汉民族有着相当大的距离，尤其是对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礼仪风俗缺乏了解。《蕙乡漫录》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：乾隆年间，内务府司员某外任扬州盐院，值丁祭（每年春秋两次祭圣庙，因都在上丁，故名），胥吏循照旧例预先提醒主人。

某曰：“何祀？”

对曰：“祭孔夫子。”

某不解，以问塾师曰：“孔夫子何人也？”

师曰：“孔子，圣人也。”

仍不解，以问奏折师爷曰：“孔子曾居何官？”

师爷曰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。”

愈不解。师爷因晓之曰：“即今之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耳。”

某恍然大悟，召胥吏及塾师责备道：“何物夫子？何物圣人？宁孔中堂而不知耶？”

这当然是个传说中的满员笑柄，不过由此却可以看出，满人因文化水平低下不得不依靠汉族文人。既要依靠汉人，又不想予以重权，这的确是件伤透脑筋的事。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呢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倚重无职衔官品的谋士与刀笔吏。这样既能处理好政务，又不致于太阿倒持，让汉族官员掌握太多的权力。清代绍兴师爷的大批涌现，应当与这种民族心

理有关。

事实上，绍兴师爷的确也很早就出现在满人的衙门里。例如，《绍兴县志资料》第一辑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位人物：

沈文奎，字清远，为明崇禎会稽邑庠生。家贫如洗，又值世乱年荒，于是北游满洲。时满伐蒙，大营驻磐石，竞投满营，充教授轻（经）年者中文，兼行营文牒。蒙古平定，满军凯旋，建都奉天，开科取士，得连捷第一甲第一名，赐进士及第，入汉军镶白旗籍。（徐绳宗《曹娥乡志稿·科贡仕进》）

所谓“兼行营文牒”，大概指的就是充当奏折师爷的行当。由此可见，早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际，绍兴人就不惜萍踪远托，游幕关外。此后，他们更是呼朋引类，以佣书舞文、舌耕心织活跃于清朝的官僚政治体制中。晚清时期绍兴师爷范寅在《越谚》中指出：

作幕，又幕师爷：分刑名、钱谷两学，越士救贫多业此。

所谓作幕，也就是在地方官署或军队里充当参谋、书记或办理司法、钱粮等事务的编外人员。他们由各级军政官员自行聘请，作为主官的私人顾问或助手。主官及其军政僚属对他们尊若上宾，称之为“老夫子”；而对一般胥吏而言，由于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，故尊称为“师老爷”，简称作“师爷”。至于师爷对于主官，也并不以顶头上司相待，只称为“东家”或“东主”、“居停”、“主人”，等等；当面则客气地称为“东翁”。范寅将“作幕（幕师爷）”一词收入《越谚》卷中《人类·尊称》里，并进而指出，充当师爷（尤其是刑名、

钱谷师爷)是许多绍兴士人栖身托足的职业。

那么,究竟是什么驱使大批的绍兴人从事这份职业?绍兴师爷对于近数百年来中国社会、风俗和文化,究竟产生过哪些影响?这一切,都应从绍兴的乡土背景中去探求。

二 一张苦嘴，一把笔刀

俗话说：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”或许是牵强附会，不知是谁曾将绍兴的“紹”字概括成：“搞来搞去，终是小人；一张苦嘴，一把笔刀。”霎时间，一副活脱脱的绍兴师爷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。其实，不单是“紹”字，即使是将“紹興”二字联在一起，也同样能勾勒出一副师爷的尊容，不信么？——“拗七拗八，一枝刀笔，一张利嘴；到处认同乡，东也馘半个月，西也馘半个月，一言以蔽之曰：八面玲珑剔透。”拍案叫绝之余，人们不禁要问：是不是绍兴这块土壤，天生就注定了将孕育出如此众多的师爷游幕四方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将视点投向了会稽山麓、镜湖之滨，投向那——

（一） 稽山镜水间的刀笔之乡

——绍兴师爷的故土

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——这是我乡衰落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。

——鲁迅《俄文译本〈阿Q正传〉序及著者自序传略》

绍兴，位于浙江省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西部，会稽山北麓。在明清两代绍兴是府名，清时绍兴府下辖山阴、会稽、

萧山、诸暨、余姚、上虞、嵊和新昌八县。自南宋以来，这里就是东南一带文风最为炽盛的地区之一。一般百姓都孜孜以诗书教子；行商坐贾、贩夫走卒也大都能看书识字。所以在绍兴一带，尊师择友，弦诵比屋，蔚成风气。

及至明清两代，由于人口的增多，绍兴成了一个地狭人稠的地区。从土地方面来看，今天绍兴市的平原面积有 650 平方公里，加上约 150 平方公里的河湖水面，共占绍兴市面积的 53%；其他为低山丘陵，面积约 700 平方公里。而根据明朝万历十三年（1585 年）统计的耕地数，当地的耕地结构是：田占 58%，地占 9%，山占 32%，其他荡、池、溇、塘、浜、沥、港占 1%。虽然二者的统计范围不完全吻合，但由此却大略可以看出，早在 16 世纪末，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。

而从人口方面来看，万历时人徐渭（1521—1593 年）曾指出，从官方户籍上看，绍兴府会稽县的人口数只有 6.2 万余人，但实际上脱漏版籍的人口“奚啻三倍之”。

然而，该县的田产，仅只 40 余万亩，富人之家，田连阡陌，往往一家就占据了几十、上百甚至数千亩的土地。因此，单单是这数千家的富户就占尽了 40 余万亩的田地。合计依靠田产过活和从事其他产业谋生的，只够让 10 万人左右不致忍饥挨饿，除此之外，身无立锥之地的人还多达 10 余万。他进而指出，即使不存在富人的兼并，将田都分给当地的百姓，也还是不能缓解土地的压力。稍晚于徐渭的绍兴人祁彪佳（1602—1645 年）也说：

越中依山阻海，地窄民稠，即以山阴一县计之，田

止六十二万余亩，民庶之稠，何止一百二十四万。以二人食一亩之粟，虽甚丰登，亦止供半年之食，是以每藉外贩，方可卒岁。（《祁彪佳集》卷6《救荒杂议》）

此种人与耕地之间的矛盾，及至清代愈来愈突出。这从绍兴一带地价的涌贵上，可以窥其端倪。据乾嘉年间著名的“绍兴师爷”、萧山人汪辉祖（1730—1807年）的描述，在18世纪前期，萧山一带的上等田每亩价格为10千余文；而到18世纪晚期，则每亩价格高达三十五六千文至40千文。其中虽然有银、钱比价波动的因素在内，但地价的增值，显然也反映了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。

如何解决因地狭人稠带来的生计问题？这自16世纪以来就一直困扰着绍兴一带的乡绅百姓。这种困惑和不安，从目连戏在绍兴一带流行的盛况中可以略见一斑。

目连戏演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。据载，这故事最早出自西晋竺法护译的《佛说盂兰盆经》，说目连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遍走世界，后在祇园精舍得到神力相助而回家。但此时他的母亲已死，并且成了饿鬼，如处倒悬，受尽磨难。目连就用钵盂盛着饭去供奉母亲，而那饭却变成了火，不得相救。情急无奈，目连只好去西天向佛祖释迦牟尼求救。释迦牟尼赐他佛号“目连”，教他在七月十五日，用盆子盛着百味食去斋养四方僧侣。目连照此办理，其母得救。

绍兴的目连戏自明代中叶即由徽州传入，从此就在当地盛行不衰，成为绍兴社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因为目连救母的故事，与人们对饥饿的恐惧心理恰相合拍。在锣鼓喧天的社戏台上，在无边佛力的铺张中，人们

可以待到暂时的解脱。

然而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幻想毕竟不能解救现实的苦难。地狭人稠带来的饥荒及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，严峻地摆在许多绍兴人的面前。《祁彪佳集》（共十卷）就花了整整两卷的篇幅专门讨论救荒的问题。祁氏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解决办法——“节食议”。他认为，绍兴一带的百姓平日里就没有什么储藏，大多是三餐食饭，所以费米最多。现在既然粮食不足，就应该三餐减为两顿，食饭改为喝粥。这样，两天便可省却一日的开销。如果大家都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年年能像这样节食的话，那么绍兴人就不必受天时的制约，也不必仰给外来的粳米了。

至于绍兴一带的百姓是否采纳了祁彪佳的建议，因文献不足征，不得其详。不过，每天仅能喝上两趟稀粥的日子想来并不好过。这里不妨举个徽州例子作个比较。皖南有句俗谚称：“天光吃饱，中午点心，落昏混混。”意思是早上一餐吃饱，中午吃一点，谓之“点心”，晚餐也很节省，所以说“落昏”随便“混混”。与绍兴相似，皖南也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地区，口粮常年不足，即使是丰年也需要从外地大批量地输入粮食。为了节省口粮，所以养成了上述这么一种习俗。不过，即使是俭啬成性的徽州人，也还是保证一天要吃上三顿，也不至于顿顿喝粥。那么，祁彪佳的建议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呢？在绍兴，有一句俗话说：“薄粥搦大肚，荒年自受苦。”（《越谚》卷上）意思是说薄薄的稀粥反而会撑大了肚皮，到荒年时更拿不出什么来垫硕大的胃口，那岂不是自找苦吃吗？由此看来，大部分的绍兴人大概不会听从那位祁大人的谆谆

教诲，而是另辟蹊径养家糊口。于是，靠借贷为生就成了不少绍兴人“救贫”的权宜之计。

《双节堂庸训》的作者汪辉祖自十五六岁起就开始“以假贷资生”，至22岁时，欠下的债务达700余金。及至30岁，以每年百金的幕修（充当师爷的收入）陆续还债。《雪鸿轩尺牍》的作者龚萼，出身于幕学世家。9岁时父亲就外出，游幕于江南一带和福建泉州等地。20岁时，父亲死去，家里没有田地，只有欠人家银钱的债票。自己也只好挟藩籍案牍之才，外出游幕，靠微薄的幕修还清债务。

上述的两个例子或许昭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——一些绍兴人早年以借贷为生，及至长大成人就出外游幕，以幕修还清债务，贴补家用。这大概也就维持着当地百姓的一种生活水准——诚如一些方志所描述的那样，明清时期的绍兴府，颇像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江南社会，无千金之家，亦无冻饿之人。此种生活环境迫使大批的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，尤其是以砚田笔耕，游幕四方。

绍兴府之所以有很多人选择“师爷”这一行当，主要是因为当地的科举竞争相当激烈。孔乙己之类的读书人，虽然写得一笔好字，也知道“茴”字有“四样写法”，但终于没有“进学”，只好穿着长衫站在曲尺形的大柜台前借酒浇愁，用“君子固穷”、“者乎”之类聊以自慰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，塑造出绍兴一带落魄的下层文人的典型形象。所谓“进学”，指的是考中秀才。在明清两代，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、州、县学的，通名“生员”，也就是习惯上所说的“秀才”。而获得“秀才”身份的考试称为“县考”。据《周作人回忆录》